
从政局变动看日本内政外交走向^{*}

——以自民党总裁选举与第49届众议院大选为中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课题组

内容提要：自民党总裁选举和第49届众议院大选，使日本内政、外交发生变动。自民党总裁候选人竞选对派系政治有所冲击，但并未触及和影响自民党一贯的保守主义路线。众议院大选后组建的岸田政府将“修宪”、“新资本主义”、“人权问题”和“强化日本防卫力”等作为内政、外交及安保的重点。岸田政府依托日美同盟强化“印太构想”及其安全机制的意向，与对华“对话”外交口号形成反差与背离的状况。

关键词：自民党总裁选举 众议院大选 岸田文雄内阁 新资本主义 日美同盟 中日关系

作者简介：课题组组长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吕耀东研究员，成员有张伯玉研究员、卢昊副研究员、孟明铭助理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D731.3；D8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874(2021)06-0001-26

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重大项目“优势学科建设”日本政治学科（编号：GJ08_2018_YCX_3918）。

新冠肺炎疫情与国际变局叠加冲击下，日本经济、社会发展面临深刻挑战，国内政治亦因此出现重大变动。2021年秋，接任首相仅一年的菅义伟在内外压力下宣布放弃参选自民党总裁。此后，安倍晋三执政时期曾任外务大臣、自民党政务调查会（以下简称“政调会”）会长的岸田文雄在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胜出，成为新的党总裁及首相，并率领自民党参加第49届众议院大选，接受民意“审判”。日本政局此轮变动，是自民党内部派系争斗以及国会选举中“问政于民”等政治要因相互作用的结果，反映出日本政党政治新的变与不变的逻辑。面临严峻内外形势特别是疫情防控与经济复苏的重要任务，

* 感谢《日本学刊》编辑部和匿名审读专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文中若有疏漏和不足概由笔者负责。

岸田内阁谋求在“安倍一营”既定战略路线下，调整具体施政理念及手段，继而推动内政外交方针实现一定程度的转变。本文拟以自民党总裁选举和第 49 届众议院大选为中心，探讨日本政局变动形势，以及在此背景下岸田新政权的内政外交走向。

一、从总裁选举看自民党派系政治的变与不变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的日本众议院选举制度改革不仅给政党之间的选举竞争带来重要影响，也使政党的内部组织发生了重要改变。如今的自民党，在很多方面已经不同于曾经的单独掌控日本政治长达 38 年的自民党。集中审视 2021 年 9 月自民党总裁选举过程，可以看到自民党派系政治新的变化及其不变的逻辑。

（一）2021 年 9 月自民党总裁选举过程

2021 年 9 月自民党总裁选举与 2012 年 9 月的总裁选举相似，是一场参选人数多、竞争激烈的混战。菅义伟宣布弃选后，最终参选者包括前外务大臣岸田文雄、前总务大臣高市早苗和时任规制改革担当大臣河野太郎以及自民党代理干事长野田圣子。菅宣布弃选前，日本国内舆论普遍认为，总裁之争将主要在菅和岸田之间展开，至于河野，无论是从作为菅政府一员（阁僚）的立场来说，还是从对自己有提携和知遇之恩的私人情感角度来看，都不便参加竞选。而菅弃选后，总裁角逐主要在河野、岸田、高市三人间展开。不可忽视的一个背景是，前首相安倍晋三在菅弃选后重新制定支持策略，影响了选举形势。9 月 4 日，安倍公开表示支持高市，后者由“泡沫”选手一跃成为本届自民党总裁选举的“潜力股”。

此次自民党总裁选举在规则上是一次标准程序选举。第一轮投票由比例为 1:1 的国会议员票（382 票）与党员党友票（382 票）组成，如果无人得票过半数，则在得票数前两位者之中进行第二轮投票；第二轮投票由国会议员票（382 票）与 47 个都道府县支部票（47 票）组成。此次党总裁选举参选者多，且无“众望所归”的有力者，因此呈现“混战”局面。河野作为自民党少壮派议员代表，舆论人气高，能够吸引较多的党员党友票，但在国会议员票的争夺中处于劣势。由于不能获得其所属派系即麻生派的“举派”支持，河野计划争取尽可能多的少壮派国会议员跨派系的支持。岸田是自民党内自由派代表，与河野相比人气不高，在党员党友票的竞争中处于劣势，但岸田

手握独立派系，且党内人脉深厚，特别是获得了部分派系领袖及资深议员青睐，因而在国会议员票的争夺中占据优势。与河野、岸田相比，高市人气不高且在党内无所属派系，其独特优势在于获得了安倍支持，因此仍可获得数量可观的国会议员票，特别是安倍所领导的细田派以及各党派保守议员的选票。

经过候选人登记、政策辩论等环节，9月29日，自民党总裁选举投票在党总部举行。第一轮投票后，四位参选人均未能获得过半数选票。岸田排名第一，总计获得256票，其中党员党友票110张（占党员党友票总数的29%），国会议员票146张。以一票之差位居第二的河野，总计获得255票，其中党员党友票169张（占比为44%），国会议员票86张。第三位是高市，总计获188票，其中党员党友票74张（占比为19%），国会议员票114张。末位的野田总计获63票，其中党员党友票29张（占比为8%），国会议员票34张。各候选人所获党员党友票的情况基本与媒体调查数据一致，^①而他们所获国会议员票的实际情况却与媒体调查数据相差较大。在国会议员票的争夺中，拥有最高国民人气的河野却成为输家，而岸田及高市则都取得了相对优势。

第二轮投票，岸田与河野展开直接对决，结果是：380张有效国会议员票中，岸田赢得249票，河野获得131票；47张都道府县支部票中，岸田获得8票，河野为39票。岸田最终获得超过六成选票（257张），战胜河野（170张）当选自民党新任总裁。从选票流向看，在第二轮投票中，上轮投给野田的国会议员票基本转投河野，高市所获国会议员票的九成则流向岸田。可以说，高市作为岸田与河野之外的“第三强”，尽管在首轮投票后出局，但支持她的国会议员票在第二轮投票中发挥了关键少数的作用，这部分选票最终决定了新总裁“花落”岸田家。

（二）自民党派系政治新变化：总裁选举不再以派系为单位进行，派系由“主角”变为“配角”

自民党单独执政时期，“派系政治”曾经是日本政治的代名词，^②自民党也被称为“派系联合政党”。自民党派系实际上是庇护主义的一种表现，即拥

^① 自民党总裁选举期间，共同通信社、日本电视台等日本媒体实施的有关自民党党员党友支持率数据显示，对河野的支持率基本在40%到50%之间，对岸田基本在20%以上不到30%，对高市维持在20%上下，对野田不到10%。

^② 自民党长期单独执政时期，权力斗争最终收敛为政党内部的派系斗争，斗争焦点也集中到自民党总裁选举上。为争夺总裁位置，派系的长期维持与派系之间的随时联合显得益发重要。由此，日本政治缩小为自民党的派系政治。参见京极纯一：《日本政治》，黄大慧、徐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41—42页。

有丰富政治资源和影响力的派系领袖为其成员提供保护和便利，其成员则对派系领袖提供支持和帮助，是以一种非对称性交换为基础而形成的。随着派系的制度化，其私人属性被弱化，核心功能却得以长期维系。^① 1955 年成立之初，自民党就确立了由国会议员和都道府县支部联合会代表投票选举总裁的制度。但是，在当时的总裁选举中，国会议员票占压倒性多数。这是以总裁候选人为中心的国会议员集团——派系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可以说，在 1955 年至 1993 年长达 38 年的自民党单独执政时期，总裁选举以派系为单位进行，派系是总裁候选人集票或争取多数派支持的工具或手段，非派系领袖担任总裁和首相是自民党面临危机时可用的一项“紧急措施”。

然而，1994 年政治改革以后，派系由自民党总裁选举中的“主角”变为“配角”。其重要原因之一是众议院选举制度改革，长期维系自民党作为派系联合体的制度性装置消失，新的制度性设置推动党的重心向以总裁为中心的 executive 部（党本部）转移。1993 年取代自民党单独执政的大联合政权虽然执政不到一年，却推动日本国会通过了以众议院选举制度改革为中心的政治改革相关四法案，废除中选举区制度而代之以小选举区比例代表并立制。1996 年 10 月日本进行了新选举制度下的第一次众议院选举，2009 年日本实现了战后首次真正意义上的两大政党间政权轮替。在小选举区比例代表并立制下，选举竞争模式发生改变，在以政党为单位的选举竞争中，领袖成为政党的形象招牌，政党领袖的个人特质和公共形象成为影响选民投票行为的重要因素，也因此成为自民党候选人在其选区当选或连任的关键。随着众议院选举由政党内竞争转为政党间竞争，个人后援会成为自民党的地方支部，候选人则成为自民党地方支部的负责人，派系在众议院选举中提名并支持候选人的功能弱化，党的重心向以总裁为中心的 executive 部转移。此外，基于《政治资金规正法》修正案和《政党助成法》，派系为其所属成员筹措或提供政治资金的功能也渐趋衰退。自民党的政治资源向以总裁为中心的 executive 部转移，派系领袖所拥有的政治资源及其影响力下降，自民党派系格局逐渐趋向流动化。

以 2001 年自民党总裁选举为转折点，派系领袖的重要性明显下降，在国民中有人气、能充当选举招牌成为竞选总裁的必要条件，也是争取多数派工作的关键。在当年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以颇具挑战性的口号——“摧毁旧自民党”“改变日本”——参加竞选的小泉纯一郎，凭借与众不同的个性和意

^① 中北浩爾『自民党—「一強」の実像—』、中公新書、2017 年、16 頁。

图改变自民党的改革形象在国民中赢得了超高人气，进而战胜派系领袖桥本龙太郎。小泉的登场，完全改变了自民党总裁选举的竞争模式，此后非派系领袖出任总裁成为新常态。小泉之后，安倍晋三、福田康夫、麻生太郎相继出任自民党总裁并担任首相，其中只有麻生是派系领袖。而且，当时的麻生派实际上规模很小，麻生能够在总裁选举中胜出，主要也是凭借其在国民中的人气而非派系力量。此外，值得关注的是，自森喜朗以来，清和政策研究会、平成研究会、宏池会三大派系的领袖不仅未能出任自民党总裁，甚至未能作为候选人参加党总裁选举。一方面是因为担任派系领袖的资质或条件，与小选举区比例代表并立制下党总裁要充当选举招牌的功能不相一致。作为派系领袖，需要在当选次数、笼络人心、筹集政治资金等方面具备相应的能力，而不一定具有熟悉媒体、擅长驾驭舆论以获得人气等党总裁必备资质。另一方面是因为派系对其成员的约束力严重下降，甚至出现派系领袖参加总裁竞选却连本派所属成员的国会议员票都不能确保的情况。^① 例如，2012年自民党总裁选举中，三大派系之一的清和政策研究会会长町村信孝参选，但第一轮投票仅排名第四而出局；在第二轮投票中，吸纳了包括町村派在内的多数国会议员票的安倍晋三最终扭转形势，压倒石破茂当选党总裁。2020年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无派系候选人菅义伟以绝对优势战胜宏池会会长岸田文雄和在国民中有超高人气但在党内没有人缘的水月会会长石破茂，成为自民党史上第一位无派系出身的总裁。2021年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胜选的岸田尽管是派系领袖，但这已是时隔14年才再次出现派系领袖当选党总裁。

虽然党员党友票的权重在自民党总裁选举中不断增加至与国会议员票对等，但是，候选人仅凭借其在国民中的超高人气也不能在总裁选举中胜出。无论是从2012年自民党总裁选举的经验来看，还是从2021年自民党总裁选举的过程来看，候选人仅凭借其超高的国民人气很难在竞选中胜出，擅长权谋术的政治家仍然会有各种打破其优势的战术。2012年采取的是二三位联盟的战术，2021年为避免再次出现“党意”与“民意”相背离的状况，则采用了新的战术——以“移动”国会议员票的方式使高气候选人不能在第一轮投票中占据第一位。此外，就连在国民中始终拥有超高人气、执政五年零五个月、内阁支持率从未低于30%的小泉纯一郎，无论是在总裁选举中的胜出，还是维持长期执政，其背后都有清和政策研究会的强有力支持；而且，在森

^① 中北浩爾『自民党—「一強」の実像—』、53頁。

喜朗担任自民党总裁和首相期间，小泉是接替其执掌森派的代理会长。

综上，派系在总裁选举中的影响力显著下降，已经由“主角”变为“配角”^①。但是，派系的部分功能仍然有效，例如派系对总裁候选人确保竞选所须国会议员推荐，以及在国会议员中拉票等仍发挥作用。

（三）派系政治不变的逻辑：受“不可见政治”游戏规则支配

在政党政治中，“派别”或派系政治是一个独特而重要的现象，在日本尤其典型。“派别和政党最初可以互换使用。派别现在更常用来指较大组织（通常是政党）内的部分或团体。尽管派别可能较为稳定且持久，并拥有正式的组织成员，但其目标和组织地位仍与其母体政党相兼容。若非如此，这些团体将会被视为‘党中之党’。有时人们将派别同‘圈子’加以区分，后者是更松散且非正式的团体，仅有共同的政策和意识形态倾向。派别主义指的是派别的滋生，或残酷的派别对立。”^② 所有政党，其内部都存在某种程度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对立。“从某种意义上讲，派别主义是只有长期执政的政党才负担得起的奢侈品。”^③

美籍意大利政治学家乔万尼·萨托利在其对政党和政党体制的研究中，认为政党和次政党层次的政治之间存在显著差别。^④ 政党层次的政治是可见的，次政党层次的政治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见的。乔万尼认为，不论其组织安排是什么样的，是正式还是非正式的，政党就是形成竞争性集团的个人的集合。当从内部来考察时，政党甚至可能是次政党的松散联盟。在政党层次——正如政党之间的选举竞争所表现的——政治是可见的。在次政党层次，政党则是不可见的，当然这是相对而言。政治进程中的很大部分都不为人所见，正如冰山一样，在水面上的只是政治的一小部分。不可见政治被刻意隐藏起来，而且包含了令人不快的腐败成分：政治资金、官职、追随者和肮脏的交易，这也是不可见政治的决定性成分。

“不可见政治”游戏规则支配着党内竞争。一方面，在政治的可见范围内，政党间的竞争以程度不同的公开承诺为特点。这就使政治家面临“保持面子”或“言行一致”等考验。“而党内竞争的参加者规模较小，而且其成

① 中北浩爾『自民党—「一強」の実像—』、57 頁。

② 安德魯·海伍德：《政治学（第三版）》，张立鹏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 年，第 165 页。

③ 同上书，第 173 页。

④ G. 萨托利：《政党与政党体制》，王明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年，第 102—163 页。

员或者是职业政治家，或者是半职业政治家。抽象的承诺是不必要的，他们根本不需要口头承诺。与其说他们重视过程，不如说他们更重视结果。如果能合理地分配职位和利益（对自己有利），他们就不必为‘保持面子’或‘言行一致’这种深刻复杂的精神问题而苦恼。”^① 另一方面，在政治的可见范围内，政党间的选举竞争受法律制约；而在政治变得不可见的时候，法律则会失去其影响，政党内竞争原则上只受内部规章和管理的约束，“不能制止阴谋的无限升级，更不能期待道德论能有限制欲望的效果”^②。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在小选举区比例代表并立制下，自民党派系政治表现出不同于中选举区制下的特点，派系功能及其约束力显著弱化，尤其是在总裁选举中，派系已经由“主角”沦为“配角”。无论派系的未来发展趋势如何，其不变的逻辑仍然是受不可见政治游戏规则的支配。

二、新首相岸田文雄的执政理念与主张

此次自民党总裁选举后，岸田文雄得以出任首相并受权组阁。长期担任政府及党内要职的岸田一直被认为是安倍之后有力的首相继任者之一。2020年与菅义伟对决败北后，岸田此次卷土重来，一方面试图尽快稳固执政基础，避免重蹈前任执政“高开低走”、迅速崩盘的覆辙，另一方面力主抓住当务之急，创出实际政绩，扭转外界对其执政手腕的质疑。目前看，岸田新政权仍将依托自民党所谓“温和保守”政治路线，基本沿袭“安倍—菅”时期的内外基本方针，但岸田亦积极寻求在政策理念、具体措施上有所变化，既彰显自身独立于前任的政见，又更有效地应对疫情下的日本经济、社会危机。

（一）以“协调”姿态巩固执政基础

岸田在竞选自民党总裁时，其胜选前景起初并未被看好。即使在“逆风”获胜执掌政权后，亦面临党内外各方的严厉审视及多重质疑，执政基础并不稳固。为争取支持、稳住阵脚，岸田在选举中放低身段，以“协调”为口号，展现出兼顾各方利益、体察民意诉求的姿态。这也延续到其当选后的政治策略上，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回应新生代议员群体的诉求。新冠肺炎疫情对日本经济、社会冲

^① 冈泽宪美：《政党》，耿小曼译，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89年，第162页。

^② 同上。

击严重，菅义伟政权因抗疫不力招致民众强烈不满，进而引发自民党党内质疑情绪。率先发难的是党内长期以来处于边缘的“新生代”议员群体，他们自认在各自选区的政治基础、民望、影响力不够坚实，如仍由菅义伟带领全党参加 2021 年末众议院选举，自己将很有可能落选，因而公开发出强烈“倒菅”信号，迫使各派系领袖放弃对菅的支持，直接导致菅义伟退出党总裁选举。在党总裁选举中，渐成崛起之势的新生代群体成为各候选人拉拢许诺的重点对象。^① 岸田为赢得该群体支持，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自民党改革方案：除党总裁外的党高层任期一届一年，最多连任三届；大胆启用中青年议员作为党干部；坚持高龄党员退休制度等，“为选举基础薄弱的年轻人和各种人才提供更大的机会”^②。

在政权组建过程中，岸田也兑现了照顾自民党“新生代”的承诺。例如，将前首相福田康夫之子、党内少壮派议员代表福田达夫提拔为“党四役”之一的总务会会长；多名党内“70 后”成员也首次入阁担任要职，如时任自民党青年局局长牧岛花莲担任数字化和行政改革担当大臣、小林鹰之任经济安保担当大臣、山际大志郎任经济再生担当大臣并负责疫情防控工作、堀内诏子任疫苗推进事业担当大臣等。岸田吸纳“新生代”议员入阁的举措确实为自己执政夯实了基础，也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自民党及其政权在国民中的新鲜感与正面形象。

第二，拉拢制衡党内各派势力。在党总裁选举中，面对在基层党员及民众中人气明显高于自己的最大竞争对手河野，岸田重点走“上层路线”，积极寻求党内主要派系领袖和资深议员的支持。相比于河野在选举中的锋芒毕露，岸田的柔顺、隐忍、稳健、不易树敌等性格特质反而使其成为党内各方势力博弈后得出的“最大公约数”。安倍、麻生等党内大佬认为岸田易受控制，且能弥合党内分歧，最终选择支持其上任，其他派系的议员们见势也随之“应和”^③，岸田因此成功当选。

岸田当选后组建政权时，一方面向支持其上台的安倍、麻生派做出回报，

① 「総裁選のカギ握る若手 欲しいのは勝てる顔、受け入れられぬ候補も」、朝日新聞デジタル、<https://www.asahi.com/articles/ASP956TBWP95UTFK007.html> [2021-08-08]。

② 「声をかたちに。信頼ある政治」、岸田文雄総裁選特設サイト、<https://kishida.gr.jp/sousaisen/> [2021-10-30]。

③ 「『『穏健』で『安定』の岸田総裁誕生にホッとしてるけど『無茶』な河野氏や『保守』の高市氏を選ばなかったことを後悔してませんか」、FNNプライムオンライン、<https://www.fnn.jp/articles/-/246052> [2021-11-09]。

另一方面也注重派系间相互制衡、对冲，从而尽可能维持自己的首相权威。首先，做出“让利”姿态，避免成为众矢之的。岸田没有为自己派系的成员过多谋取职位，初期只有金子恭之（总务大臣）、金子原二郎（农林水产大臣）和堀内诏子三人入阁^①；其次，安倍、麻生领导的细田派、麻生派获得不少自民党高层和内阁僚职位^②，但岸田在具体职位安排上煞费苦心，力争让两派人士分享权力、相互制约，避免一家独大；再次，岸田还委任党内其他派系人士担任要职，来制衡细田、麻生两派，如竹下派的茂木敏充（外务大臣，后继任自民党干事长）、小渊优子（党组织运动部部长）以及二阶派的小林鹰之、山口壮（环境大臣）等；最后，岸田尤为注意防备安倍、麻生直接影响内阁运作，比如在内阁官房长官一职的人选上未接受安倍推荐的亲信萩生田光一，而是任命了同属细田派但与安倍关系较疏远的松野博一，党干事长一职则任命了麻生派的甘利明（后改为茂木敏充），而非安倍亲信高市早苗。

第三，积极迎合党内保守右翼势力。岸田所领导的宏池会一直秉持重视经济发展、拥护和平宪法、维护民主体制等政策立场，对华态度相对温和。但随着自民党内政治保守化倾向加剧，宏池会不可避免受到影响。岸田文雄2012年担任派系领袖后，为迎合以安倍晋三为首的保守势力领导层，逐渐偏离了宏池会的传统路线，在修改宪法、解禁集体自卫权、重新武装日本等问题上立场转向，因此与宏池会前任会长古贺诚反目^③。在本次自民党总裁选举中，岸田为最大限度争取党内支持，在政见上更加明确迎合安倍为首的保守势力，还对安倍个人“表露忠心”，在公众舆论关注的几项涉及安倍丑闻事件的处理问题上，始终表现出暧昧或逃避态度。这些行为对岸田胜出确实起了重要助推作用。

尽管岸田当选首相，并自诩能够在执政中“天衣无缝”地代表和统合各方势力诉求，但在疫情形势严峻、社会矛盾尖锐的状况下，加之部分内阁成员缺乏政务经验，新一届内阁能否胜任仍存不确定性，其施政实绩将直接影响岸田政权的支持率。缺乏政治威望的首相及其领导层成员分别代表不同的

① 截至本文发稿时，岸田派的林芳正在茂木转任党干事长后继任外务大臣一职。

② 细田派在党内和政府中任职的有高市早苗（党政调会会长）、福田达夫（党总务会会长）、松野博一（内阁官房长官）、岸信夫（防卫大臣）、萩生田光一（经济产业大臣）、末松信介（文部科学大臣）等人；麻生派在政府和党内任职的有麻生太郎（党副总裁）、甘利明（党干事长）、铃木俊一（财务大臣）、牧岛花莲（数字化和行政改革担当大臣）、河野太郎（党宣传部部长）等人。

③ 「自民総裁選、岸田氏に自制促す 菅首相の再選支持—古賀氏—」、時事ドットコムニュース、<https://www.jiji.com/jc/article?k=2021081900880&g=pol>[2021-09-09]。

利益集团，如遇难以弥合的党内分歧，完全依赖政治权术加以平衡极为困难，如处理不好，政权随时可能陷入困境。

（二）强化政府权力、推动防疫进程

疫情应对是当下日本所面临的最为紧迫的任务。此前安倍、菅两任政权走向终结的主要原因皆在于防疫效果不佳。岸田因此对于疫情防控非常重视，将其置于施政纲领的突出地位。岸田执政后，首先提出了疫情防控的两大原则：一是用可以接受的方式对广大民众进行说明、说服工作；二是设想最坏情况并制定应对标准。在此原则下，岸田进而提出了所谓防疫对策“四大支柱”：（1）进一步强化医疗体制，确保不会再因人才、设施紧缺而出现所谓“医疗难民”；（2）实施大规模经济救济政策；（3）强化病毒检测能力并推出电子疫苗证明；（4）强化传染病应对能力。岸田所公布的防疫政策效果仍需时间检验，但从其政策内容可辨识出防疫理念上的一条重要主线，即通过强化政府权力，进一步提高防疫政策实际效果。在岸田的防疫政策宣传中，多次出现“国家主导”“活用国家权限”等字眼，并明确提出为应对公共卫生危机，将设立“健康危机管理厅”作为统领中央和地方自治体防疫工作的“强有力司令塔”。

岸田所提出的以上主张，实际上代表着日本政治精英在此次疫情中对本国政治体制与社会治理模式的深刻反思。日本国内暴发疫情以来，自民党政权的施政能力遭到批判，民意支持率也因此下滑。民众不满的焦点在于政权与执政党面对疫情威胁，始终无法采取坚决、果断而有效的手段，以阻断疫情扩散趋势、充分保障国民权益并实现社会生活正常化。日本国内舆论认为，疫情下的这一现象暴露出日本首相及中央政府在目前的政治体制内缺乏施政空间和手段、国家权力被私权严重制约的问题。有日本学者指出，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与加强首相权力的改革同步，日本基于新自由主义理念强化私权，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制衡地方及各行业的权力大幅度缩小，从以往“上下、主从”关系向当下的“对等、协力”关系转换。“现行法律体制下，如果某地区或某行业的防疫对策不同步，中央几乎没有什么办法”^①。例如，日本政府多次明令餐饮业配合疫情防控政策停止营业或减少营业时间，但仍有许多餐饮企业照常运营，成为疫情传播的重要途径。2021 年 7 月，菅义伟政权负责防疫的经济再生大臣西村康稔暗示将考虑对不遵守防疫规定的企业予以惩罚，结果引发餐饮业和金

^① 竹中治堅『コロナ危機の政治 安倍政権 vs. 知事』、中央公論新社、2021 年、211 頁。

融业等对其“滥用权力”的强烈抗议，迫使西村和菅义伟先后出来道歉。^①这也成为2021年7、8月变异的新冠病毒在日本肆虐的重要背景。

针对这一问题，岸田在自民党总裁选举时表示，应考虑修改现行法规，在遇到疫情等紧急状况时强化政府权力，在必要时可以“完全封城”，对民众私权加以限制。^②关于岸田的上述主张，以安倍为代表的不少政界人士公开表示认同和支持。^③学界也有声音指出此次疫情暴露出日本在国家动员能力上存在体制性缺陷，未来应“有条件地效仿”二战前的战时动员体制，提高国家行动力。^④另据《日本经济新闻》舆论调查，77%的受访民众认为各政党有必要讨论是否在宪法内加入限制私人权利的紧急事态条款。^⑤然而，日本长期施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小政府、反干涉”的政治思维根深蒂固。作为自民党重要后援且与岸田关系密切的经济界团体正不断催促岸田放开人员流动限制，以重启各种经济活动，这也会对岸田政权的防疫政策产生影响。^⑥在全球疫情持续、新型变异病毒不断出现的情况下，如岸田政权决策失误，导致日本出现新一波疫情高峰，将对其执政造成沉重打击。

（三）构建“日本式新资本主义体制”

岸田文雄的竞选纲领及施政言论中，最受关注的无疑是其提出的“日本式新资本主义”理念。岸田主张，当前日本经济、社会正处于严重困境，但造成困境的根本原因并不仅仅在于疫情，还涉及日本经济体制长期固有的深层问题。“自小泉内阁以来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虽然一方面使我国经济得以增长，但贫富阶层差距却扩大了。仅有经济增长并不会使人获得幸福，

① 「西村氏『働きかけ』発言、政府火消しに躍起『圧力』『恫喝』反発強く」、https://www.sankei.com/article/20210709-3RPRB4PRCJLALKMUW3OFYTAVAA/?outputType=amp&_twitter_impression=true[2021-10-10]。

② 「総裁選4候補、“ロックダウン”賛否割れる」、日テレNEWS24、<https://www.news24.jp/articles/2021/09/18/04941701.html>[2021-10-10]。

③ 「改憲で私権制限明確化 安倍前首相」、時事ドットコム、<https://www.jiji.com/sp/article?k=2021061800930&g=pol>[2021-10-10]。

④ 田中明彦「遅れたコロナ対応 日本、非常時体制に不備」、読売新聞オンライン、<https://www.yomiuri.co.jp/serial/earth/20210530-OYT8T50004>[2021-10-10]。

⑤ 「改憲『議論すべき』高水準 日経調査で7割超続く コロナ禍の私権制約が背景」、日経電子版、<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XZQOUA317L80R30C21A5000000>[2021-10-10]。

⑥ 「GoToトラベル再開へ準備 岸田首相 コロナ対応『第5波の2倍でも対応可能な医療体制つくる』」、東京新聞Web、<https://www.tokyo-np.co.jp/article/136848>[2021-10-10]。

将增长成果进行（合理）分配才是重要的。”^① 因此，岸田认为有必要将日本经济原有的自由主义发展路线调整至“日本式新资本主义”上来，实现增长与分配的良性循环。

就具体措施而言，为建设所谓“日本式新资本主义”，岸田以增长和分配作为两大政策领域，分别提出了“四大支柱”。其中，增长政策的四大支柱依次为：（1）推进科学技术立国战略，设立 10 万亿日元的大学科研投资基金；为投资、研发和人才培养机构提供资金支持和税制优惠；制定包括核电在内的绿色能源政策。（2）保障经济安全，为确保日本在战略上的“自律性”和“不可或缺性”，制定《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推进“自由可信赖的数据流通”建设，设立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3）提出“数字田园都市国家构想”，在全国普及完善 5G 通信基础设施，并利用居家上班、无人驾驶等新兴经济活动模式，振兴地方经济，缩小城乡地区差距，设立“数字社会推进委员会”专门负责信息化工作。（4）进一步完善就业、生活、住房等领域的社会保障制度，实现“劳动者社会保险全覆盖”，使人们实现“终身安心的人生”。在分配政策方面，岸田提出的四大支柱包括：（1）构建企业、股东、职工三方共赢的经济制度，改革企业信息公示制度，通过增加非财务信息披露力度来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加强对分包交易的监管。（2）扩大社会中产阶级收入，制定“令和收入倍增计划”以提高劳动者实际收入，特别是针对育儿家庭生活负担进行补贴。（3）提高公共服务机构收入，设立“公立价格评价服务委员会”，推动养老护理人员、幼儿园教师、保姆等服务行业的收入提高。（4）对所谓“财政单年度主义”进行纠正，在科学技术发展、经济安保等需要长期投入的国家课题上，加大财政投入的计划性与持续性。

在制定增长与分配两大领域的相关支柱政策后，为实现增长与分配的良性循环，岸田还承诺逐步实施以下政策措施：在各省设置科学技术顾问，负责各产业领域的企业的整合，优化资源配置；为支持开放式创新经济而加大税制优惠、政府资源调配、企业起步支援等；支援中小企业事业重组改制、提高生产能力；支持企业扩大投资，加强人力资源建设；推进金融所得税改革；改组“规制改革推进会议”，设置“数字技术临时行政调查会”等。

岸田的“日本式新资本主义”理念，反映出日本执政精英在内外压力下，

^① 「『成長と分配の好循環』による新たな日本型資本主義—新自由主義からの転換へ—」、岸田文雄公式サイト、<https://kishida.gr.jp/activity/7727>[2021-10-10]。

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方向进行了重要反思。近年来，日本新自由主义经济的弊端日渐凸显，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进一步加深了这一危机。高度私有化的医疗体系与应急机制既无能力也无动力保障民众安全；缺乏监管的企业为摆脱危机，肆意大量解雇非正式员工；为赈灾而发行的各项国家补助因缺乏目的性，反而扩大了社会贫富差距。在这种情况下，岸田的政策理念被认为继承了宏池会传统的意识形态“底色”，特别是岸田提出的“令和收入倍增计划”与“数字田园都市国家构想”，分别与池田勇人执政时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以及大平正芳执政时的“田园都市建设计划”极为类似。^①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岸田政策具有浓厚的凯恩斯主义色彩，是对自中曾根康弘时代开始的新自由主义路线的回调。^②

岸田期望从经济政策入手，扭转疫情下日本经济持续下滑、社会矛盾尖锐的严峻局面，进而使其产生政治效应，安抚国民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的情绪，提高自己的政治声望。但“日本式新资本主义”理念能否落实尚有疑问。推动真正意义上的增长与分配政策改革，势必要与自民党内、日本国内的利益集团进行激烈斗争，在执政基础不稳的情况下，岸田是否拥有足够力量和胆魄推进此项改革，前景很不明朗。事实上，岸田上台后，其“日本式新资本主义”名义下的政策承诺也出现了一定倒退，比如暂时中止推进金融所得税改革等。^③如果岸田无法兑现其最具“招牌效应”的经济政策，将导致民众失望，使其执政基础受到削弱。

三、从岸田组阁看日本的外交安保政策理念及意向

在日本政坛总体保守化的情况下，执政的自民党的外交理念进一步趋于保守化、右倾化。从2021年的自民党总裁选举及众议院选情来看，自民党的政策理念并没有脱离该党一贯的保守主义路线。岸田内阁仍然坚持自民党一贯的保守主义外交理念，提出符合自身特点的安保政策意愿。

① 「岸田首相はお公家集団のプリンス カギは苦労人・池田勇人の教え」、朝日新聞デジタル、<https://www.asahi.com/articles/ASPB43R7YPB2UPQJ004.html>[2021-10-10]。

② 「岸田政権と市場反応、衆院選後に株価再浮上か」、<https://jp.reuters.com/article/column-fujito-norihiro-idJPKBN2GW02E>[2021-10-10]。

③ 「岸田“口だけ”首相の正体見たり！政権発足1週間で目玉政策が次々と後退」、日刊ゲンダイDIGITAL、<https://www.nikkan-gendai.com/articles/view/life/295918>[2021-11-09]。

（一）“安倍理念”仍影响岸田政府的外交安保政策取向

首先，“安倍理念”与岸田政府的外交安保政策具有一定的相关性，特别是岸田文雄在其内阁中保留了现任防卫大臣、安倍的胞弟岸信夫。岸信夫是作为“安倍理念”的传承者，被安倍安插在菅义伟内阁中担任防卫大臣，目的就是延续安倍晋三执政未尽的安保战略。岸信夫是日本政界中有名的“国防通”，一直致力于推进安倍倡导的“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研讨和落实。“亲台”立场鲜明的岸信夫出任岸田内阁的防卫大臣，仍然是安倍政治影响力发挥作用的产物，必将对今后日本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产生深刻影响。如此看来，实现超长期执政的安倍晋三将继续发挥对于党政人事和外交安保政策的影响力，在未来一段时间的日本内政外交中，“安倍理念”因素会依然存在。

具体从安保政策层面来看，“安倍理念”在自民党总裁选举和众议院大选中依然存在。尤其是安倍晋三对中国的强硬立场和强硬防御政策，仍然对日本政坛具有很强影响力。在 2021 年 9 月竞选自民党总裁时，高市早苗就对媒体透露受到前首相安倍晋三的言语激励，称“必须完成安倍政府留下的重要课题”。^① 安倍在 2020 年 9 月卸任前发表讲话，敦促下届政府展开“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相关讨论。但是，接替安倍的菅义伟首相在 2020 年底通过内阁会议决定把新建“宙斯盾系统搭载舰”等作为替代方案，事实上搁置了“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相关讨论。^② 对此，高市早苗、岸信夫等安倍的追随者不断提出意见，表示应该尽快对“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展开讨论。高市早苗把拥有在对方国家疆域内阻止弹道导弹的“对敌基地攻击能力”作为自民党总裁选举的“亮点”，迎合拥护安倍的党内保守势力。她主张修改并完善法律，以允许展开使敌方基地暂时丧失功能的网络和电磁波攻击，一旦开战，“尽早让敌方基地瘫痪的一方将获胜，而可以使用的工具是电磁波或卫星”，若不如此，“日本就会陷入悲惨境地”；需要尽快开启被菅义伟政府暂时搁置的围绕“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讨论，并且“必须尽早得出结论”。^③

2021 年 9 月竞选自民党总裁时，岸田文雄也把安倍担任首相期间力促讨

① 「動き出した高市氏、安倍前首相の支援は『本気だ』揺れる岸田氏」、『朝日新聞』2021 年 9 月 7 日、https://www.asahi.com/articles/ASP9765SJP97UTFK015.html?iref=pc_ss_date_article[2021-09-09]。

② 《日防卫相欲就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加速讨论》，共同网，2021 年 9 月 10 日，<https://china.kyodonews.net/news/2021/09/175e52d8a927.html>[2021-10-09]。

③ 《高市早苗称可用电磁波让敌方基地瘫痪》，共同网，2021 年 9 月 10 日，<https://china.kyodonews.net/news/2021/09/f435ce1bbf80.html>[2021-10-09]。

论的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列为“热门选项”，表达了拉拢党内保守势力的想法。岸田表示，拥有在敌方国家疆域内拦截弹道导弹的“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是一个“有力的选项，必须展开讨论以保护国民的生命与生活”。^①岸田作为以“轻武装、重视经济”路线闻名的前首相池田勇人组建的党内派系宏池会会长，为了竞选自民党总裁，不得不拼命消除宏池会的鸽派形象。这引发了自民党派系内部一些资深议员对宏池会存在意义的质疑和不满，认为“这是对安倍的揣度”。^②10月19日，出任日本首相的岸田文雄在国家安全保障会议上表示，为从根本上强化防卫力，“包括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在内，都是将要明确探讨的选项”。^③可以说，岸田首相在安全保障等领域顾及保守派，在许多事项上深深体现了政调会会长高市早苗的政策主张。^④

其次，岸田政府延续了安倍执政时期防卫费增额的惯性。2021年9月竞选自民党总裁时，高市、岸田都强调了日本防卫费增额的必要性。高市主张日本的防卫费“与海外各国相比过少。不在必要之处投重金的话就无法守护日本”。^⑤在以防卫费增额加强安保方面，出任自民党政调会会长的高市，在安保政策方面极富保守色彩，显示出追随“安倍理念”的政治姿态。自民党在10月12日公布的众议院选举竞选纲领中提出，比照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成员国的目标，力争增加日本防卫的相关费用，考虑使之达到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以上。日本财务大臣铃木俊一就增加防卫费一事表示：“不应以财政方面的规模为前提，而是需要在建设高质量防卫力的意义上加以考量。”^⑥事实上，日本防卫省决定在2022年度防卫费预算申请中计入逾5.4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3197亿元），将超过2021年度原始预算的5.3422

① 「自民総裁選、对中国・安保に濃淡 岸田氏、人権担当新設/高市氏、対サイバー新法/河野氏、安保戦略見直し」、『朝日新聞』2021年9月14日、https://www.asahi.com/articles/DA3S15042236.html?iref=pc_ss_date_article[2021-10-09]。

② 《日本自民党总裁候选人争相拉拢保守人群》，共同网，2021年9月22日，<https://china.kyodonews.net/news/2021/09/95e9a5eee3b7.html>[2021-10-29]。

③ 《岸田称将探讨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共同网，2021年10月19日，<https://china.kyodonews.net/news/2021/10/0157b1d3ba4d.html>[2021-10-29]。

④ 《自民党众院竞选承诺仓促制定，岸田色彩淡化》，共同网，2021年10月13日，<https://china.kyodonews.net/news/2021/10/cba6c8dee93a-.html>[2021-10-29]。

⑤ 《高市早苗称可用电磁波让对方基地瘫痪》，共同网，2021年9月10日，<https://china.kyodonews.net/news/2021/09/f435cc1bbf80.html>[2021-10-29]。

⑥ 《日本财务相称防卫费不应预设规模》，共同网，2021年11月2日，<https://china.kyodonews.net/news/2021/11/6f6d5e9e6f8.html>[2021-11-09]。

万亿日元，刷新历史最高纪录。^① 岸田文雄当选自民党总裁、出任首相，离不开安倍晋三等自民党实力派的认同和最终支持，而岸田当选后打出的外交和安保政策也在延续和体现着“安倍理念”。

（二）岸田政府提升日美同盟“层次”的意愿

日本外交战略既定的基本路线是，在日美同盟框架内强调不断提高外交自主性、在地区甚至全球范围内谋求话语权和主导权。岸田在第 205 届国会首相就职演说中表示：“我国外交与安全保障政策的基石就是日美同盟。我将身先士卒，把作为印太地区以及世界和平与繁荣根基的日美同盟提升到更高层次。”^② 这显示出岸田政府不仅要继续深化日美同盟，而且要向“更高层次”提升日美同盟关系的强烈意向。

首先，岸田政府力求向“更高层次”提升日美同盟关系。战后以来，日本以日美同盟为基轴的外交传统一直没有改变，若说有变也只是调整过程中的不断加强与深化。围绕如何才能做到向“更高层次”提升日美同盟关系，在此次自民党总裁竞选时各位候选人给出了答案：以“中国威胁论”，作为强化日美同盟的逻辑起点。高市早苗提出有关美军在日本列岛部署中程导弹“已是必须”。关于部署美军导弹的必要性，高市主张“若被攻击后没有任何报复就不会有威慑力”，她强调各国竞争的是谁最早“让敌方基地瘫痪”。岸田文雄也倾向于这样的论调，他假设日本遭受外敌连续导弹攻击，指出“必须考虑防备（敌方）二次攻击”，而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被其定位为“有力选项”，并把大幅增加防卫费纳入考虑范围。河野太郎表示应该加强日本自身防卫力，以“提升威慑力”。^③ 上述几位候选人均表达了向“更高层次”提升日美同盟关系的政治取向。

2021 年 10 月 5 日，岸田文雄首相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首次电话会谈，就强化日美同盟、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的合作达成一致。这是岸田组阁后首次与外国首脑举行电话会谈，体现了日本新首相重视日美同盟关系的惯例。岸田与拜登确认了钓鱼岛属于规定美国防卫义务的《日美安全条约》第五条

① 《防卫省下年度预算申请额或超 5.4 万亿日元创新高》，共同网，2021 年 8 月 19 日，<https://china.kyodonews.net/news/2021/08/50d12149454d-54.html> [2021-10-29]。

② 首相官邸「令和 3 年 10 月 8 日第二百五回国会における岸田内閣総理大臣所信表明演説」、http://www.kantei.go.jp/jp/100_kishida/statement/2021/1008shoshinhyomei.html [2021-10-10]。

③ 《自民党总裁选举候选人主张对朝加强威慑力》，共同网，2021 年 9 月 15 日，<https://china.kyodonews.net/news/2021/09/3de9c9f23f49.html> [2021-10-10]。

的适用对象；双方认为作为印度太平洋地区以及世界和平、安全与稳定基石的日美同盟十分牢固；岸田就立即解决朝鲜绑架日本人问题谋求美国的理解与合作，拜登对此表示支持。双方还就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及气候变化、实现无核武世界采取举措等全球规模的课题达成紧密合作共识，双方商定推进协调以尽快实现面对面会谈。岸田在会谈后向媒体强调“这次首脑通话是把日美同盟提升到新高度的重要一步”。^① 11月2日，岸田首相在英国格拉斯哥出席《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会议（COP 26）首脑级会议期间，与拜登进行首次会面，以“拜会拜登”的形式完成了就任首相后的首次面对面外交，期望以此赢得美国的信任。

其次，日本有条件同意增加驻日美军驻留经费，避免影响日美同盟关系发展。近年来，美方计划提升美军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存在感，要求日本以增加美军驻留经费负担金额的方式给予配合。美方以应对中国军事力量发展、朝鲜核与导弹开发为由强调驻日美军的重要性，而日方表示财政形势严峻，难以大幅增加美军驻留经费负担金额。尽管日本将驻日美军驻留经费美其名曰“温馨预算”，但对特朗普执政时期要求日本提高安全“保护费”数额的做法大为不满。按以往惯例，关于驻日美军经费负担的日美磋商是在日本编制预算的上一年年底前谈妥，而2020年美国特朗普要求大幅增加日本负担的驻日美军驻留经费，日美双方磋商未能取得进展。2021年1月拜登政府成立后，日本提议磋商工作暂时延长一年，得到了美国的同意。这显然是给重视同盟国的拜登调整驻日美军驻留经费设定了时间期限。关于2021年度驻日美军驻留经费负担，日美两国政府于2021年2月24日签署协议，把现行特别协定期限从2020年度末延长一年。特别协定通常每五年更新一次，延长一年实属罕见。2021年度日本的负担额为2017亿日元^②，与2020年度保持同一水平，用于支付驻日美军基地的水电煤气费及员工的劳务费、训练转移费等。至于2022年度以后的负担金额，日美表示将再行商议，力争2021年内谈妥。

岸田文雄上台后，对于美国要日本大幅增加驻日美军驻留经费的负担额提出了有条件妥协方案。日方判断，驻日美军驻留经费负担将有所增加，但大概不会是美国前总统特朗普要求的那种巨额负担。日方拟把日美联合训练等的经费作为增额部分，力争在2021年底与美国达成共识，2022年初签署特

① 「首相、米大統領と初の電話協議」、『朝日新聞』2021年10月5日。

② 《日美就美军驻留经费协定延长一年签署文件》，共同网，2021年2月24日，<https://china.kyodonews.net/news/2021/02/4a8ebe0d51ec.html>[2021-02-26]。

别协定。协定的有效期计划和以往一样，定为 2022—2026 年的五年。日方打算把完善自卫队与美军共同使用的机场以及联合训练等所需经费作为增额部分，而不是增加美军基地的水电燃气费等原有负担。日本政府认为这种增额将有助于强化同盟，容易获得日本国民理解。关于联合训练等的增额部分，日美将探讨是否在特别协定中以新设项目的方式计入。可见，岸田政府同意增加驻日美军驻留经费的同时，也宣布将增加自身防卫预算。这是日本将维护和扩大日本在印太地区政治、军事存在和既得利益的重要信号。

（三）加强“印太构想”下的安全机制构建及价值观外交

岸田文雄在第 205 届国会首相就职演说中表示：将以美国为首，联合澳大利亚、印度、东盟、欧洲等，与这些同盟国和志同道合的国家携手，充分发挥日美澳印四边框架的作用，大力推进“自由开放的印太”。^①岸田上台伊始，就与美国、澳大利亚、印度寻求加强“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的共识，谋求日本外交的战略自主性。同时，致力于强化日美同盟，推动日美澳印“四边机制”（Quad）的军事与非军事合作，一致抗衡中国。

首先，提出强化日美澳印“四边机制”的意向。美国拜登政府视中国为“唯一竞争对手”，十分重视被称为“四边机制”的日美澳印四国机制。2021 年 10 月 5 日，岸田首相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首次电话会谈时，双方确认强化日美澳印“四边机制”。10 月 5 日上午，岸田首相与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举行首次视频会谈，双方一致同意将面向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加强包括美国和印度在内的“四边机制”合作。两人还确认将推进日澳在安全和经济领域的合作，并申明“强烈反对单方面在东海和南海改变现状的尝试以及经济威胁这一立场”。^②10 月 8 日，岸田首相又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首次电话会谈。双方一致同意将在“四边机制”中密切协作，并为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开展合作。两人就强烈反对单方面凭实力改变现状的尝试以及经济施压达成共识。^③日本海上自卫队于 2021 年 10 月 15 日至 18 日与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海军在印度近海的孟加拉湾实施战术训练。综上可见，日本十分重视日美澳印四国安全机制，将矛头直接指向中国。

① 首相官邸「第二百五回国会における岸田内閣総理大臣所信表明演説（令和 3 年 10 月 8 日）」、http://www.kantei.go.jp/jp/100_kishida/statement/2021/1008shoshinhyomei.html [2021 - 10 - 26]。

② 「首相、首脳外交デビュー 米豪と」、『朝日新聞』2021 年 10 月 6 日。

③ 《岸田与莫迪通电话确认加强合作》，共同网，2021 年 10 月 9 日，<https://china.kyodonews.net/news/2021/10/18fe04821005.html> [2021 - 10 - 29]。

其次，提出加强日美澳印的经济安全保障合作。2021年9月25日，在日美澳印四国首脑举行的首次会议上，除重点就强化半导体供应链合作达成一致外，还磋商了扩大在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推进经济安全合作，以应对崛起的中国。与会者强调有必要在尖端技术领域维持日美澳印的优势，减轻半导体和重要矿物资源的对华依赖。此外，还有意通过强化太空合作，制定由四国主导太空的国际规则，以对抗力争2030年建成航天强国的中国。^①岸田在第205届国会首相就职演说中称：“将在新设的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领导下，实施确保战略性物资、防止技术外流的举措，构建自律性经济结构。制定相关法案，以打造牢固的供应链，推进我国的经济安全保障。”同时，在与美澳印等国家首脑通电话时，也商讨了将强化供应链和加强经济安全保障领域的合作。

可以看出，日本力图构建稳固的日美澳印四边合作机制，寻求在“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中提升自身影响力和号召力；以维护亚太及世界和平和经济繁荣共同目标的名义，积极构建基于所谓共同价值观的“民主国家”政治及安全机制，提升日本对亚太地缘战略的控制力。

四、岸田政府对华政策与中日关系走势

岸田文雄就任首相后，将外交安保列为疫情防控与经济振兴之后的“第三重点政策”。相比前任菅义伟，曾在安倍时代长期担任外务大臣的岸田更加擅长外交事务，且对自己的外交操盘能力更为自信。从岸田所提出的日本外交新“三原则”，即坚守民主等基本价值观、坚守日本的和平与稳定、为全球性课题的解决做出贡献来看，较之菅义伟政府，岸田政府在维持“安倍一营”时期外交基本路线的前提下，对外政策主张更为体系化、明确化，主动作为的倾向有所凸显。这也反映在岸田政府对华政策上。

（一）岸田涉华表态特点

安倍执政时期，岸田曾是安倍对华外交的核心幕僚及“忠实执行者”。此次自民党总裁选举期间及当选首相后，“转换角色”的岸田在沿袭前任外交方针及口径的同时，在对华政策上做出了更为频繁且明确的表态。日本政论人

^① 「日米豪印の4首脳が共同声明 中国を念頭『自由で開かれた秩序を』」、『朝日新聞』2021年9月25日。

士认为，面对中日关系微妙而复杂的气氛，岸田做出“毫不畏惧、直面上”的姿态，希望展示外交手腕，进而获得朝野支持。在此期间，岸田的涉华表态至少体现出以下特点。

首先，岸田在自民党总裁选举期间与当选首相后的涉华表态有明显差异。总裁选举期间，岸田积极迎合党内保守势力，力图消除自身“鸽派形象”，做出对华强硬姿态，声称“将把应对中国作为首要任务”，并宣称设立专门负责人权问题的首相助理，在涉华人权问题上坚决地采取干预姿态。^① 选战期间，岸田还在接受电视采访及推特中多次主动提及中国问题，展现出对华“不妥协态度”，并在安保政策方面提出日本应积极探讨“对敌基地攻击能力”。^② 对此，日本舆论一致认为，岸田此举旨在赢得党内保守势力选票，并利用舆论对中国崛起的警惕情绪，最大限度争取舆论支持，为其执政铺平道路。^③ 岸田在党总裁选举期间涉华表态更多是为选举目标服务，而在其当选自民党总裁及首相后，涉华表态逐渐回归理性，开始提及与中国“协调共存”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2021 年 10 月 4 日，在当选首相后首次举办的官邸记者会上，岸田在答记者问时就中日关系表示，中国是日本重要邻国及最大的贸易伙伴，“考虑到各种各样的民间交流等，（中国）对日本来说是重要的国家，必须继续维持对话”。^④ 10 月 7 日，岸田与习近平主席通话，表示将以 2022 年中日邦交正常化 50 周年为契机，共同构筑富有建设性的、稳定的中日关系。^⑤ 10 月 8 日，岸田在首次国会施政演讲中表示：“与中国构筑稳定的关系，对两国乃至地区和国际社会都极为重要。”^⑥ 显然，岸田的表述符合近一阶段日本官方对华政策的“常规话语”。这也反映出岸田在执掌政权后，开始从现实出发，调整并

① 「岸田氏 人権問題担当の首相補佐官を 中国念頭に」、『日本経済新聞』2021 年 9 月 12 日。

② 「岸田氏、中期防改定の前倒し視野 尖閣防衛で法整備検討」、『日本経済新聞』2021 年 9 月 13 日。

③ 「外交こそ首相の仕事、すぐ行動を」、『朝日新聞』2021 年 10 月 8 日。

④ 首相官邸「岸田内閣総理大臣記者会見」、https://www.kantei.go.jp/jp/100_kishida/statement/2021/1004kaiken.html [2021 - 10 - 29]。

⑤ 首相官邸「習中国国家主席及びモディ・インド首相との電話会談等についての会見（令和 3 年 10 月 8 日）」、https://www.kantei.go.jp/jp/100_kishida/statement/2021/1008kaiken2.html [2021 - 10 - 29]。

⑥ 首相官邸「第二百五回国会における岸田内閣総理大臣所信表明演説（令和 3 年 10 月 8 日）」、https://www.kantei.go.jp/jp/100_kishida/statement/2021/1008shoshinhyomei.html [2021 - 10 - 29]。

重新定位对华政策，使其更具有平衡性、可行性与可持续性。

其次，岸田的对华表态仍具有鲜明的协调与制衡两面性，且更试图彰显后者，即主动制衡中方的政策立场及行动。安倍执政后期及菅义伟执政时期，日本官方对华政策表态在“保持协调合作”的前提下，开始强调对华姿态的“坚决”乃至“强硬”，即“（面向中国）坚持应该坚持的主张”，“不妥协于（中国的）压力”。岸田也不例外。10月4日，岸田就任当天发布的内阁基本方针称：“将与中国保持对话沟通，坚持应该坚持的主张，强烈呼吁中国采取负责任的行动。”岸田在当晚的内阁记者会上重申“该说的就要好好说”，并就东海、南海问题“不点名”批评中国“以力量改变现状”，暗指中国所遵循的行为准则“与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价值观不同”。^①在与习主席通话、承诺坚持对华协调后，岸田特别对外强调，自己“提及了两国之间悬而未决的问题”，“虽然日中两国之间存在着作为邻国的各种问题，但是，应该坚持的主张当然要坚持”。^②

在维持对华表态两面性的基础上，相比前几任特别是菅义伟政府，岸田的表述体现出两个特点。一是更加强调对华采取坚决的外交态度，乃至将开展对华合作的先决条件设定为中方必须接受日方的要求。在岸田政权对华政策表态以及官方报道中，这些表述被置于更靠前、更显要的位置。^③二是更为明确地提出要联合其他国家，发动“民主盟国”力量来制衡中方行动。岸田在各种场合的发言中一再表示，日本可能也必须与“民主盟国”加强合作，促使中国“采取负责任的行动”。^④正如政论人士所指出的，这既是日本依据当前形势强化对华制衡的一种姿态宣示，同时也是对其他“民主盟国”发出的共同制华行动的呼吁^⑤，对内可以安抚顺应保守势力，对外亦可以释放政治信号，在对华博弈中争夺先机。

最后，岸田执政初期的“多边外交”中，一方面回避直接提及中国，另

① 首相官邸「岸田内閣基本方針」、https://www.kantei.go.jp/jp/kakugikettei/2021/1004kihon_housin.html[2021-10-29]。

② 首相官邸「習中国国家主席及びモディ・インド首相との電話会談等についての会見（令和3年10月8日）」、https://www.kantei.go.jp/jp/100_kishida/statement/2021/1008kaiken2.html[2021-10-29]。

③ 「岸田氏、外交は安倍・菅路線を踏襲 G20で日米会談探る」、『日本経済新聞』2021年9月29日。

④ 「中国抑止へ日米豪印の協力重要に」、『日本経済新聞』2021年10月23日。

⑤ 「アジア安定へ新戦略を対中国、安保連携を急げ」、『日本経済新聞』2021年10月10日。

一方面仍多次以间接方式表示了在涉华问题上的关注、干预立场。比如在执政后一系列首脑“电话外交”中，岸田频繁地提起中日间的矛盾问题，争取获得美、印、澳等国的认同。在此后的日本与东盟系列峰会上，岸田亦就东海、南海以及中国新疆、香港的所谓“人权问题”发表言论，阐述日本“坚定立场”。^① 在涉台问题上，岸田在外交活动中不断重申日方“重视维护台海和平稳定”这一“固有立场”。10月11日，岸田在众议院代表质询中表示，将与台湾继续维持“非官方的实质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力图进一步深化日台间的合作和交流”，还承诺“将关心关注围绕台湾的局势”。^②

（二）岸田对华政策发展趋势

根据目前的情况，综合各方信息，可以判断：在接下来可预见时期，岸田政权的对华政策将在“安倍一营”对华政策的延长线上发展，2022年夏季参议院选举，在内外环境总体稳定的前提下，岸田的对华政策不大可能出现“激变”，对华政策乃至对外政策大局仍将服从于岸田“稳政权、抓防控、促经济”的内政目标。而在总体倾向与具体领域表现上，岸田对华政策将至少体现出以下发展趋势。

首先，在战略上，对华协调合作与牵制防范并重。一方面，岸田所领导的宏池会对华政策相对温和，岸田也深知与中国保持沟通、合作的重要性，因而倡议中日领导人定期会谈，不排除2022年借邦交正常化50周年重启中日高层互访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岸田不忘反复强调“将与共享普遍价值的同盟国和志同道合的国家携手”，共同制衡中国。在与美、澳、印等国领导人通话时，岸田积极主张加强双边、多边战略合作，共同制约中国的行动。日方还拟推动日美印澳“四边机制”与日欧战略合作对接，以发挥“印太”构想网罗多方力量、对华多边制衡的作用。正如日方一些战略学者指出的，在外交和安全保障方面，如何应对美中对立仍是日本的核心焦点问题。^③ 日方打算通过进一步强化日美同盟和以日美澳印为代表的多边合作与中国抗衡。在维持对华关系“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充分利用外部力量开展多种形式的对华牵制防范，仍将成为日本对华政策的基本战略方向。

其次，在战术上，强硬立场与维持协商相结合。岸田对华政策的具体操作将在协商调和与施压促变间寻求一个现实平衡点。在公开场合，岸田政府

① 「対中外交、牽制か融和か 経済安保の行方、試金石」、『朝日新聞』2021年10月19日。

② 「岸田首相への衆院代表質問」、『朝日新聞』2021年10月12日。

③ 「自民党新総裁に岸田氏 外交の注目点を有識者に聞く」、『日本経済新聞』2021年9月29日。

将维持乃至强化对华相对强硬，在矛盾争议问题上保持对华批评立场，至少做出不妥协姿态；但在实际操作中，岸田政权仍将寻求与中方保持沟通、避免在重大敏感问题上发生正面冲突。至少从目前情况看，岸田的政策团队具有较成熟稳定的政治理性与政策理念，倾向于通过“坚忍不拔的谈判”解决争端。在对华政策上，日方内部逐步形成了“示强在（自民）党”“协调在政（权）”的微妙平衡，两者相互制约。在实际政策操作中，政权内部的务实派人士与专业外交官仍会发挥重要作用，倾向于中日间以外交协调而非对抗解决问题。比如在东海钓鱼岛问题上，岸田政权在积极强化“实力后盾”、不断对华示以强硬姿态、争取博弈优势的同时，仍将以相对务实的姿态，维持与中国的协商渠道，开展相对有效的危机管控。

再次，在具体领域上，积极发挥“价值观外交”对华施压作用，但亦有所顾忌。岸田期待借“人权外交”取得政绩，一再声称在涉台、涉港、涉疆等“人权问题”上将“果断应对”，要在价值观问题上进一步紧跟美西方，保持对华距离，以充分彰显“道义姿态”，并借此保持对华政策压力。在其他方面博弈空间被压缩的情况下，“价值观外交”日益成为日本重点运用的对华制衡工具。台湾问题上，岸田政府继续将“台海和平”与所谓价值观因素捆绑，敦促国际社会关注台海，制约中方，同时与台保持勾连，逐步推进与台湾当局的“战略呼应”。^①但岸田清楚中方在内政特别是台湾问题上的底线，在试探中国的同时也避免激怒中国。如对于“十一”国庆期间中国军机进入台“防空识别区”，日本官方仅表示“期待和平解决”，与表示“严重关切”的美国态度不同，反映出其希望维持中日关系稳定的考虑。日方亦有观点认为，由于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强硬态度”，以及中美两国未来可能的妥协前景，日本在台湾问题上进行“战略腾挪”的空间正在缩小，“应当更加审慎地处理（涉及台湾的）问题”。^②

最后，对中日经济合作保持积极态度，但也不放弃对华制约手段。岸田政权的“经济安全战略”很大程度上以中国为针对方，但同时深谙对华经济产业“脱钩”难以实现。岸田将恢复日本经济作为最大政绩来源，离不开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对华经济合作需求尤甚。鉴此，岸田政权将在坚持所谓官方经济合作“高标准”“透明化”原则的同时，支持民间企业加强与中方经

① 「台湾海峡 危うい挑発を憂慮する」、『朝日新聞』2021年10月7日。

② 「対中外交、牽制か融和か 経済安保の行方、試金石」、『朝日新聞』2021年10月19日。

济联系。在区域经济合作方面，岸田政权将展现更多灵活性，对“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落实深化、“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FTA）谈判态度相对积极。关于中国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岸田一再强调中方应满足该协议的“高标准”，但对中方参与磋商持开放态度，并不排斥。^① 围绕全球及地区贸易机制建设，中日间仍存在规则与观念上的竞争，但维护自由贸易与多边协商原则、就新问题展开积极磋商的政策共识仍比较稳固。

（三）岸田执政后中日关系的基本走势

日本政局变动将增加中日关系所面临的复杂形势。“后菅义伟时代”，中日关系将维持两个基本现实：一方面，两国共同利益纽带仍将保持强韧，难以真正“脱钩”，日本对华经济依赖总体将持续加深。中日经济相互依存，加之岸田对任内业绩的极端渴求，成为谋求中日关系企稳向好、确保中国对日政策影响的重要依据。疫情发生以来日本对华市场依赖持续加深，2020 年对华贸易在其对外贸易中占比达 23.9%，对华投资收益在其海外投资总收益中占比达 16.7%，均创下历史新高。另一方面，日本对华认知和态度日益负面，并趋于固化。日本因人口结构老化、竞争优势削弱，加之周边外交困顿、疫情防控失败，正面临空前的国际战略压力与社会内在张力，对华心态难以理性调适，对华强硬成为体现“政治正确”、服务选举目标的常规政治牌。

换言之，岸田执政后对华政策总体上将沿袭前任方向并服务于国内政策目标，但在具体施策方面仍有调整余地，乃至存在较大变化可能。基于中日在经济、人文领域的强韧纽带，以及在确保共同外部环境稳定发展方面的共同利益，加上中日高层围绕保持协商对话、共同维护双边关系所形成的基本共识并未改变，中日关系“基本盘”仍有可能保持稳定，在务实合作方面仍有改善进步的可能。但从日本总体战略、日本国内涉华舆论、精英集团政治姿态等方面看，中日关系所面临的不确定性仍然很强，更需警惕下行趋势走强。特别是，需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的风险因素。

一是受国内政治因素驱动，日本政界对华舆论攻击将再掀高潮。从 2021 年 9 月底自民党总裁选举至 2022 年 7 月参议院选举，日本将进入一个持续时间较长的“政治季节”；岸田执政基础相对薄弱，日本重现强力领袖缺位、政

^① 参见：「TPP 中台交渉、日本試練 台湾へ『歓迎』中国には『見極め』」、『朝日新聞』2021 年 9 月 25 日；「岸田首相 中国の TPP 参加は不透明」、『日本経済新聞』2021 年 10 月 5 日。

局不稳的状态，政府政策延续性将持续面临冲击；老一代知华派政治家淡出政坛而后继乏人，对华稳健派、理性派声音逐步被激进派、极端派压倒，国内对华舆论氛围持续恶化。这些因素交织叠加、相互激荡，或将导致日本对华强硬姿态脉冲式上升，对中日关系稳定及日本对华战略耐心构成考验。

二是受美国战略牵引，日本可能更主动配合美国对华制衡。当前，中美博弈进入深化期，美国运用军事同盟、意识形态及地缘政治工具，综合制衡中国的态势持续加强。在此情况下，基于锁定美国战略支持、开展对华竞争策略需要，日本仍有可能加强与美方的战略协作，包括在安全政策及矛盾焦点问题上的联动。如协作加强在第一岛链、台海周边军事部署，以应对台海冲突之名制定“军事应变计划”，强化日美联防与日台互动，威胁中国周边安全，妨碍中国统一大业；在东海推进“军警融合”，加强自卫队对海上保安厅后方支援，在“西南防线”加大部署雷达哨点、战机及陆基导弹，强化两栖作战力量；围绕海、岛之争，在外交、历史、国际法等多条战线对华展开较量。这些将导致中日矛盾激化，“擦枪走火”风险显著上升。

三是为强化对华制衡力度，日本可能调动更多政策工具，避免“受制于华”的同时力争对华博弈优势。具体包括：进一步强化“价值观外交”，在中国香港、新疆、台湾等涉华内政问题上加强干涉力度，挑战中方底线，加剧两国对立；更多利用七国集团、日美印澳“四边机制”、日欧合作等多边平台，调动国际舆论，就人权、病毒溯源等问题对中国发难；持续谋求高科技领域对华“脱钩”，乃至支持推动对华“封锁”，与印澳等“民主盟国”打造“供应链联盟”，垄断战略资源及关键原材料供应，在贸易、高质量基建、数字经济等规则制定中，联合美欧提出针对中国的替代方案或抵制措施。考虑到避免与中方矛盾扩大，日本在运用上述工具时的范围、频率与强度将会有所控制，但以上日方对华制衡手段的综合运用，势必加剧两国关系紧张，增加矛盾管控难度，阻碍中日政治安全互信恢复以及经济人文领域合作的展开。

五、结 语

以菅义伟弃选自民党总裁为契机，日本国内政局发生重大变化。2021 年秋的自民党总裁选举和此后的众议院选举，不仅决定了当下日本政治权力归属与格局形势，很大程度上也将引导接下来日本内政外交走向。自民党总裁选举的政治过程与结果显示，日本政党政治特别是派系政治已经发生新的变

化，在党内“新生代”要求“改朝换代”的呼声下，传统派阀运作机制受到冲击，部分功能被削弱，但改革不会导致派阀消亡，而是促使它呈现新的形式，涉及权力分配的基本政治逻辑、包括“不可见”的政治运作仍在支配着日本政局变化，推动各方力量博弈走向新的阶段。

在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胜出的岸田文雄面临着与一年前菅义伟上台时类似甚至更为严峻的内外局面。全球疫情持续的背景下，日本国内疫情仍难以缓解，且还有再起危险，日本政府在防疫、振兴经济与改善民生等方面的课题不减反增；国际变局下大国博弈特别是中美战略竞争进入新阶段，处于其间的日本必须妥善应对，方能保障自身国家利益与国际战略地位。为应对内外变局，岸田政权在竭力巩固政治基础前提下，重点推出疫情防控、“日本式新资本主义”以及更具主动性的外交安保政策，力图在维持政策稳定延续的同时，逐步体现“岸田特色”，积累并彰显较前任更进一步的政绩。但是从目前看，将岸田提出的系列政策设想付诸实践仍面临较大难度，且施政效果能否尽快显现，也是岸田必须考虑的问题。如果岸田无法在较短时间内拿出可视化的政绩，政权稳定恐会受到很大削弱与动摇。

从政策取向看，岸田政府将会以国内问题为施政重点，但在对外政策上也将积极行动，坚持“安倍一营”时期保守路线，以日美同盟为基础，对华制衡与协调两手并用。面临中美战略竞争这一“核心矛盾”，日本政府一方面力争在中美之间调整“站位”，另一方面也力求超越中美战略竞争的架构，拓展战略行动空间。在岸田政权继续推进对华两面政策且制衡意向与手段可能继续增强的情况下，中日关系面临着较大不确定性与挑战。但需看到，中日关系仍有稳定发展的前提条件与可能空间。2022 年中日将迎来邦交正常化 50 周年，尽管当下中日关系与 50 年前的中日关系在外部环境上发生了很多变化，但两国仍共享大量共同利益及关切，两国有必要也有可能充实双方关系的内涵，挖掘拓展新的合作空间。

（责任编辑：唐永亮）

Abstracts

The Trend of Japan's Domestic and Foreign Affai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anges in the Political Configuration: Focusing on Elections of LDP President and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IJS Research Team*

The election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Liberal Democratic Party (LDP) and the 49th election of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have caused changes in Japan's domestic and foreign affairs. The LDP's presidential candidate election has shaken the politics of "pro-politics", but it has not affected the party's traditional conservative position. After the elections, the Kishida administration attempts to focus on constitutional amendment, new capitalism, human rights issues, and strengthening Japan's defense capabilities as domestic, foreign and national security priorities. The Kishida administration's intention to strengthen the "Indo-Pacific vision" and its security mechanism based on the Japan-US alliance contrasts with and deviates from its slogan of keeping diplomatic dialogue with China.

The Most Important Ally in for the United States under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Japan's New Approach toward China *Shi Yinhong*

Japan is the most important ally for the United States under the Joe Biden administration. In the context of China's dramatic rise, the former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Shinzo Abe and the former U. 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laid foundation for a Japan-U. S. super-special partnership in containing against China, while Abe's successor Yoshihide Suga and that of Trump Joe Biden had further improved it remarkably.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Suga administration, as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had constantly strengthened precautions and containment and rollbacks against China, Japan provided its closest cooperation with U. S. at the strategic and military fronts. On the Taiwan issue, Japan has severely damaged the bottom-line of the political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and developed a fundamental national policy to launch a large scale military intervention in the possible breakout of warfare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Over the disputes over Diaoyu Islands and East China Sea, accompanying with repeated declarations from Biden of the applicability of the article 5th of the U. S. - Japan Security Treaty to the Diaoyu Island issue,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has frequently declared its opposition against China's unilateral efforts to change the status quo in East China Sea, and it has been very active in promoting the Biden-led Indo-Pacific coalition of QUAD mainly targeting on China, even playing some leading role at times. Meanwhile, Japan still have a degree of prudence toward relations with China, trying to maintain Japan's profitable trade